

许多人不知道，端午节一度被定为“诗人的节日”。那是在抗日烽火中，山东蓬莱籍诗人臧云远与会聚在重庆的一些诗人，倡议把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端午节定为“诗人的节日”，以此来召唤人们团结起来共御外侮，振奋抗日军民的信心和士气。臧云远积极参加纪念活动，撰写了大量纪念诗文。

史海钩沉

蓬莱籍诗人臧云远与『诗人的节日』由来



□郑学富

参与起草《诗人的节日缘起》

臧云远于1913年1月出生于山东蓬莱城里一个书香世家，自幼受到良好教育，在家乡中学毕业后去北平求学。1932年，臧云远在北平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，开始了革命的文艺生涯。1933年春，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，臧云远前往武汉，与蓬莱同乡杨朔等人创办大型文艺综合刊物《自由中国》。1938年秋，臧云远参加华北救国会的前线慰问团。1939年秋，他在重庆加入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（简称“文协”），从事诗歌创作及文化统战工作。当时，臧云远与臧克家并称“山东二臧”。

1940年6月10日端午节晚上，“文协”70多名会员举办“纪念屈原晚会”，臧云远作报告后，几位会员朗诵诗歌，这时有人提议把端午节定为中国的“诗人的节日”，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。与会人员纷纷发言，相互补充意见，最后达成共识：决定每年端午节为“诗人的节日”，用“文协”的名义向全国推广宣传，待下一年端午节举行第一届诗人的节日纪念活动。

1941年端午节前，为办好第一届诗人的节日纪念活动，“文协”组织人员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备。老舍在《第一届诗人的节日》一文中回忆：“柳倩、安娥、云远、方殷，还有几位，就征求纪念文字，并与各报纸接洽出特刊。”

臧云远等人起草了《诗人的节日缘起》一文，经郭沫若修正后，在端午节之前印刷出来，向社会各界广泛散发。这篇文章全文800多字，热情洋溢地赞美了屈原，提炼出了屈原精神。文中把纪念屈原与当前抗战联系在一起，以诗人的文采和激情，号召人们弘扬屈原的爱国精神，投身到反对侵略的抗战中去，“我们决定诗人的节日，是要效法屈原的精神，是要使诗歌成为民族的呼声……是要向全世界高举起独立自由的诗艺术的旗帜，诅咒侵略，讴歌创造，赞扬真理。中华民族新生的朝气在飘荡，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精神在飞扬，中国新的诗艺术的光芒，将永远在宇宙中辐射。”

《诗人的节日缘起》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，各界人士热烈响应，纷纷拿起笔来撰写诗文。为营造纪念诗人的舆论氛围，《新华日报》于1941年5月30日开辟专版，“编者的话”说：“今日为旧习相传屈原的忌辰，又为第一个诗人的节日，本报今日所登有关诗人的各作家稿件，全系‘诗人的节日筹备会’所供给，盛意可感。特此附告。”专版发表了郭沫若《蒲剑·龙船·鲤帜》、柳倩《纪念与任务——

祝贺第一个诗人的节日》、和山《关于离骚》、李石峰《从“咚咚……”说到屈原》、七律《吊屈原》和《诗人的节日的缘起》。

1941年5月30日晚7时，“文协”举行晚会，庆祝第一届诗人的节日。驻重庆的各大报纸都对第一届诗人的节日作了浓墨重彩的宣传。

诗人的节日激发创作热潮

诗人的节日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为切入点，进行抗战动员，成为联合文艺界、鼓舞抗日斗志的凝聚点和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。自1941年至抗战胜利之前，每届诗人的节日都举行纪念活动和颇有规模的诗歌朗诵会，形成了制度化。一时间，凭吊、纪念屈原的诗词和文章创作蔚然成风，以屈原为主人公的小说、戏剧、论文、随笔数量激增。

诗人的节日还激发了以抗战为题材的创作热潮。1939年，剧作家陈定在《群众周刊》上看到了关于日军夫妻自杀的报道文章，随即以此作为素材，写成了剧本《官毅与秋子》，后经臧云远、李嘉作词，黄源洛作曲，最终于1941年完成反战题材歌剧《秋子》的创作。《秋子》在重庆国泰大戏院首演时，周恩来、叶剑英等到场观看，并给予鼓励。由臧云远编剧、王云阶作曲、吴晓邦导演的大型歌舞活报剧《法西斯的丧钟响了》，戏排好后，在重庆“抗战堂”公演，一次就卖掉了两天的票。

1943年6月7日晚，第三届诗人的节日纪念晚会召开。臧云远在《国讯旬刊》第337期发表文章《迎接第三个诗人的节日》，文中说：“纪念屈原，学习屈原，把屈原的纪念日当作诗人的节日，是中国诗人的光荣，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……”

撰文感怀第六个诗人的节日

1946年端午节前夕，反对内战及争取和平、民主与自由的呼声在全国各地响起。6月4日，迎来了第六届诗人的节日。当天晚上8时，重庆“文协”和诗歌音乐工作者协会举办了第六届诗人的节日茶会。《新华日报》报道说，沙汀、艾芜、靳以等100余人参加。臧云远主持，指出在诗歌中所表现的沉闷、艰苦、激动与希望，这正是反映了中国人民八年来现实生活，并着重指出诗人是属于人民大众的“歌手”。会上还先后报告了八年来的诗歌运动、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，一致提出今后的诗歌道路只有大众化，深入人民生活，与现实相结合，使其成为人民自己的东西，要使诗歌广泛地深入到人民生活中去，同时从人民群众中生长出无数的诗歌工作者。会上还朗诵了艾青的《吴满有》、禾波的《欢迎普遍的民主运动》等诗作。

1946年6月4日的《新华日报》发表了臧云远的《第六个诗人的节日》。文中回顾了六年来的诗人的节日的纪念活动，“这六年的日子，走过了不短也不长的路子，路上是充满了血和泪、欢乐和痛苦的，而欢乐不在山城。”他质问：“是谁在制造民族的灾难？”他“仿佛看到了我们的朋友，在上海，在北平，今天也在过诗人的节日吧”，最后写道：“山城也并不是寂寞的，还像往年一般，江面已经划起了龙船，这恐怕是我们在山城最后一次过自己的节日，我们是多么盼望着四万万同胞过太平的日子，我们也好好地过一次自己的节日呢。”

过完诗人的节日后，臧云远回到青岛，整理旧有诗稿，开写长篇小说，与岛上文坛名人来来往往。1949年冬，臧云远在北京出席新中国第一届文代会。他先后担任过济南华东大学教授、艺术系主任，青岛山东大学教授兼艺术系主任，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。1991年盛夏，臧云远病逝于南京。

（本文作者为枣庄市政协文史馆馆员、枣庄市首批社科智库专家）

投稿邮箱：qlwbrwqilu@163.com

□戴永夏

端午是我国民间三大传统节日之一，历来很受人们重视。因为时值盛夏，毒虫孽生，在过去医疗水平低下的年代，常常疾病蔓延，瘟疫流行，所以端午节的许多习俗都与驱瘟防疫有关。

过去每到端午节这天，家家一早就将艾枝插在门上，意在御鬼邪于大门之外；或用艾蒿编成人形、虎形（编成虎形的谓之“艾虎”），挂在门楣中央或戴在身上，以禳毒气、除瘟病。还有的地方，端午这天男女头上都戴艾叶，据说这样也可以驱瘟辟邪。这些习俗历史久远，南北朝宗懔的《荆楚岁时记》就记载说：“以艾为虎形，或剪彩为小虎，帖以艾叶，内人争相戴之。”明代学者彭大翼撰《山堂肆考》载：“端午以艾为虎形，或剪彩为虎，粘艾叶以戴之。”

在蓬莱、长岛等地，端午节有张贴剪纸的习俗，在一扇门上贴艾虎，另一扇门上贴葫芦，叫做“贴艾虎”。济南则是将“五毒”形象的剪纸做成门符贴在门上，用以驱“五毒”，防瘟疫。

除了插艾蒿以外，在胶东地区，还会加插桃枝，用以驱邪。

菖蒲、艾蒿、雄黄都是中药材，过去在端午节这天，人们都要饮用这三种药材泡的酒，以驱瘟防病。有的还将菖蒲雄黄酒抹在小孩的面颊、耳鼻、手心、足心等处，以防毒物侵害。清代诗人蔡云在《雄黄酒》一诗中形象地写道：“称锤粽子满盘堆，好侑雄黄入酒杯。余沥尚堪祛五毒，乱涂儿额噀墙隈。”还有的口含菖蒲雄黄酒喷洒在床帐间、墙壁上及隐蔽处，边喷边念叨：“雄黄烧酒喷上来，蛇虫百脚（蜈蚣）快跑开。”

许多地方在端午节这天给孩子戴香包，在孩子手腕上系五彩丝线。香包是用棉织品和丝线绣成的，内装雄黄、苍术等中药、香草，戴在身上可驱瘟疫。系五彩丝，常被用来驱恶辟邪。这种彩色丝缕一

直戴在手腕上，要到“六月六”才剪下来，丢进河沟里，让水将“病魔”冲走。此俗远在汉代就已经出现，东汉应劭的《风俗通》载：“五月五日以五色丝系臂，名长命缕，一名续命缕，一名辟兵缯，一名五色缕，一名朱索。”

在鲁南等地，端午节孩子们会戴“五毒兜”，手腕、脚腕系五色“禄寿线”。

端午节绘贴五毒图，可以辟毒虫之害。五毒图是以蝎子、蜈蚣、蟾蜍、壁虎、毒蛇五种毒虫的形状绘制的图案。用五毒图辟毒有多种方式，有的将“五毒”绘制在“辟瘟扇”上，相互赠送。有的将五毒图绣在香包上，在身上佩戴。还有的在端午节这天穿五毒衣。如明代宦官史家刘若愚的《酌中志》记载，自五月初一至十三，宫内太监、宫女都穿着绣有五毒虫图案的五毒衣和艾虎褂子。儿童也在端午节这天穿五毒衣或五毒背心、五毒鞋等，以辟邪、免灾、祛病、除害。

蛤蟆墨是用癞蛤蟆加墨制成的药物。过去每到端午这天，早晨天亮之前，许多人都跑到田野水塘边捕捉癞蛤蟆（蟾蜍）。将捉到的癞蛤蟆带回家，将墨锭从蛤蟆嘴里塞进肚子，待蛤蟆憋死后，再放在中午的太阳下暴晒。晒干后的蛤蟆即为蛤蟆墨，据说可治多种疾病。当皮肤红肿发炎时，将蛤蟆墨用唾沫稀释敷于患处，可消炎解毒，所以过去民间常把它当消炎膏使用。

旧时过端午节，还有挂葫芦的习俗。每到这天，家家户户都在门前悬挂纸葫芦，以禳毒防病。纸葫芦是用各色彩纸折叠而成，葫芦下面缀有纸穗，显得十分精巧美观。端午节将纸葫芦挂出来，除了辟邪，也为节日增添喜庆气氛。山东德州一带就有挂纸葫芦的习俗。

在胶东地区，端午节当天，人们还会用露水擦脸，尤其会擦眼睛和耳朵，有明目之说。

（本文作者为济南出版社编审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原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）

